

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

陈 嘉 明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要建立起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 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 二是中国的五四启蒙与西方的启蒙在批判的对象、提供的思想观念及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同; 三是由于这些不同所引致的中国正在形成的现代性所具有的特殊形态。图强、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反封建专制)、发展、和谐等, 相继构成中国现代化追求过程的系列主题词, 从而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 可以从对它们的反思中进一步求得。

关键词: 现代性; 启蒙;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79(2006)03-0001-03

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首先不可避免地遇到解释框架的问题。要建立起这种解释框架, 我认为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 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属于“质”的范畴, 其状态如何只可描述而不可测度; 现代化则是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 是现代性观念在经济、政治、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运作。它与“现代性”概念相对而言, 属于“量”的范畴, 其状态是可以量化的, 如人均GDP多少, 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三个产业各自的产值与所占比例是多少, 平均每万人有多少医生和病床, 每百人里大学生有多少, 等等。不过, 现代化与现代性虽然是不同的范畴, 但两者却是相辅相成的, 就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现代性观念为现代化提供着目的论、价值论与方法论, 现代化则使这样的观念成为现实。此时现代性体现为现代化的结果, 即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心理与形态。

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而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确实表现了这一点。即使同在西方, 同属资本主义国家, 英、法、德、美等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但这些国家尽管现代化的道路不

同, 它们的文化对现代性的认同则是一致的, 都受相同的启蒙观念的引导, 把现代性看作是以理性和自由为根本, 表现为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这一情况向我们显示, 不同的现代化途径可以表现为相同的现代性, 它展现为一种“理一分殊”的状况, 亦即不同的现代化表现中有其共同的“理”。这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不同, 但是否中国的现代性也会同西方的相一致?

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应当到启蒙的观念中去寻找。有如上面提到的, 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的相同性, 在于它们享有相同的启蒙观念, 而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共同的现代化方式。因此, 分析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异同, 看来也应当从中国的启蒙观念分析起。这就使我们转向了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这里且不提此前的启蒙)所批判的对象与提供的思想观念与西方不同, 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都是由各自的启蒙运动所提供的, 并且在共同的意义上, 启蒙都是要使民众的思想摆脱愚昧的状态。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用当时的话来说, 叫做“开民智”, 启发民众的觉悟, 以达到“新民”的目的;

收稿日期: 2005-12-20

作者简介: 陈嘉明(1952—), 男, 福建闽侯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的启蒙用康德的话来说，是要使民众“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达到思想自由、敢于运用理性的目的。但不同的是，西方的启蒙针对的是宗教迷信所造成的蒙昧，而五四的启蒙针对的则是世俗的儒家封建文化，特别地，五四的启蒙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危亡中的中国，它首先是一个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负有救亡的使命。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西方的启蒙不仅是现实的、政治的，而且也是学术与学理的，是一个持续的学术文化建设过程。它以“理性”与“自由”为口号，着眼于“理性”精神与“自上”等人权的的确立，以之作为人的根本，社会与文化的根本。五四启蒙的口号则是“科学”与“民主”，它主要是救亡的，经世致用的，从根本上说并非是学术的、学理的。这么说的根据是，中国的启蒙并没有产生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著作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这样的既是启蒙的、同时又是学术原创的传世经典。这一事实也可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反省、认识学术研究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与作用。

与“科学”、“民主”属于实证的、“现象世界”的范畴相比，理性与自由属于“形上”的“本体世界”的范畴。科学是理性认识的一个工具，民主是实现自由的一个手段。因此，理性与自由是“体”，科学与民主是“用”，只讲“用”而不讲“体”，是认知上的不到位。只讲科学与民主，就还没有进入根本的层面，即现代意义上的“人是什么”的层面，人的“主体性”的层面。现象世界的价值是由学理性的哲学文化来给定、确立的；现实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是由学理性的哲学文化来哺育与培植的。仅仅单纯的思想启蒙而未能进行学术的建设，启蒙的观念就还不能成为民族的文化，还不能内化为民族的精神与“国民性”。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人的现代性，即人在观念与行为上的现代性。只有通过具有现代观念的、理性的人的支撑，社会才能真正发展起科学与民主。

由此来看，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相比，显现出它在现代文化底蕴上的欠缺，这种欠缺是在文化底层上的，亦即有关理性与自由的价值。理性是思想自由、科学认知的心灵基础。具体说来，理性意味着自由地思想，科学地思想，合理地思想，批判地思想；它尤其意味着不盲从、不迷信；它在本质上是质疑的、批判的。这样的理性精神不从根本上建立起来，社会就还有造“神”的蒙昧基础，尤其是在封建传统文化依然以风俗习惯等方式产生着

影响的中国，就会容易陷入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式的统治，亦即一种依靠个人权威的、非法理规范的统治方式。

当然，中西启蒙的这种差别是由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中国的启蒙为什么没有进入理性与自由的深层，乃是由于国家危亡、局势紧急所迫。对此孙中山有着透辟的说明：“如果是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大家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①启蒙后来的发展是转为革命，革命接续了启蒙，从此中国开始了一连串的革命。从民国的“国民革命”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建立新中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行进在一个特定的革命时期中。革命特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及其话语掌控，产生的通常是“革命”的文化，例如革命的文艺，其主旨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而不是为全社会、全体公民服务的，它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这与学术所需要的氛围正好相反。学术必须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不同的启蒙观念产生不同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观念所造就的积极结果，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形成重视科学与教育的意识与习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振兴科学与教育，制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并不断寻求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引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从消极的方面看，启蒙上的“理性”观念的缺失，在经济建设上的表现是主观冒进，缺乏理性的思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理性的行为与后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诸如“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极端无效率的组织管理方式，“大跃进”的无视客观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冒进方式。这些非理性的表现固然主要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但从行为的角度上看，则无疑属于非理性行为的范畴。这些与韦伯归结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特征的“理性化”行为，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不能合乎理性地组织生产，只能是属于“前现代”的东西。

在政治方面，从理性化的角度看，一系列激进主义的政治行为也可以被归结为非理性化。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建设，一方面曾受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且有过之无不及，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搞乌托邦式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本来，民主的一个特征就是程序化，而程序化意味着

理性化。不建立起规范程序的民主，就是无规范、无理性的民主，从而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可依赖的民主制度。

其三，由于启蒙观念的不同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不同，中国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性自然与西方的不同，有着自己的特殊形态。如何对中国的这一现代性进行解释，尤其是构建出有关的解释框架，这是研究者们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一框架的构建无疑有其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如何界定“中国的现代性”，认定它包含哪些基本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基本上是由启蒙运动所提供，虽然启蒙也有思想的分歧，但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构成其主流。而中国的启蒙从清末开始、经历五四运动及其以后，随着革命的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接连更迭，现代化过程也表现为一种革命型的震荡式推进，其间模式多次变换。这使得中国当今有效推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以往的诸种话语之间发生着某种“断裂”。如果我们在现代性研究中把在近现代曾经发生的、有所影响的观念都作为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加以陈述，虽然这有助于了解现代性观念的纷争，但却使我们难以把握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发展线索及其核心的价值观念。

对革命所产生的同先前的制度与文化之间的断裂的估计不足，使得我们在以往的文化研究、现代性研究中，过多地局限于现代—传统这一对解释框架，过于突出了传统的影响。传统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已退居其次。文革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终成功启动与推进，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它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改革的，并非是什么传统的东西，而恰恰是教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本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其主旨是寻求超越与建立一种不同于以“自由”为主导价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建立一种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努力，与其说它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传统，不如说是来自于执政党内部的教条保守势力。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见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困难还在于，在现有的西方现代性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两个理论话语系统中，都不存在能够现成移植来解释中国现代性的框架。这样，在中国这一因革命的巨变而出现断裂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能够既注意到中国现代性的现实性（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注意到它的历史连

续性（从清末以来的观念启蒙与理想追求），从中把捉前后相续的、实际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理念，本文认为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这就是，基于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的理念必须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认知理念，是形塑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价值理念，它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范导性的作用。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反思，本人的初步想法是，如果将自清末起，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追求以来所先后出现的认知理念与价值理念开列出来，似乎可以说，“图强”、“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反封建专制）、“发展”、“和谐”等，相继构成中国现代化追求过程的系列主题词，从而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可以从对它们的反思中进一步求得，从中挖掘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与特征，刻画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性质。在上述理念中，“图强”（追求民富国强）与“发展”尤其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取向与价值定位。如果说从清末以来追求国家的“富强”是中华民族所认可的基本价值，那么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价值已取而代之，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它并将决定着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品格。

在上述理念中，“富强”的观念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从贫穷中开始现代化起步的中国人来说，它是民心所向，构成巨大的创业动力，是现代化的强劲无比的“引擎”。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被设定为改革开放的目标，这样的利益驱动在有效的政策支持下，通过竞争释放出了社会巨大的生产力。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以追求富强为目标的取向，其负面的影响是容易激发起人性中的“贪欲”。与西方现代性的走向世俗化特征相反，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很世俗的国家，几乎不存在平衡欲望的宗教神圣性，亦即韦伯所称的新教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现代化的发动以追求富强为目标，并且市场经济的转向开启了许多致富的机会，这难免勾起人们的物欲与贪欲，“一切朝钱看”成为一种社会趋向，“暴富”成为最狂热的梦想。在这样的趋向中，企业的改制成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甚至连原本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文明与清高之光环的医院与学校，有些也沦为舆论所指斥的敛财工具，成为当前

（下转第48页）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 汪玉凯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0 年 [M]. 北京: 中洲古籍出版社, 1998.

[3]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地方组.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指导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4] 江泽民.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摘编) [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尼斯·C·缪勒. 公共选择理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6] [美] 科斯·诺思. 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 [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its Inner Momentum

WU Zhihua

(The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hina has carried out five rounds of political reform. Although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e anticipated results have not yet been achieved. Lack of inner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this in turn has to do with the interest paradox confronting those who implement political refor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t of proposals which might provide inner momentum for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Key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terest relevance, inner momentum

(上接第 3 页)

最受抨击的社会问题。此外，敛财的欲望同样也筑成官员腐败堕落的渊藪。因此，以富强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现代性，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威胁是感性物欲的侵扰，这使社会依然处于马克思曾经痛斥

的那种“金钱拜物教”状态。“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是对追求“富强”导向的一种匡正，它是中国现代性理念的一个提升。

(责任编辑 付长珍)

注释:

①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 页。

On the Issues Essential to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China's Modernity

CHEN Jia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China's modernity, attentions are to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1) Modernity is different from modernization; 2) The objects criticized, the ideas provided, and the consequences followed of China's May 4th enlightenmen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3) As a resul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China's modernity takes a special form. Making strong, reformation, revolution, science, democracy, development, harmony, etc., have become consecutively the keywords of China's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reflecting on them,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China's modernity will emerge.

Key words: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modernization